



# 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文本性质与墨家贤人观的扩充机制\*

李健胜

**摘要:**清华简《程寤》《说命》《尹至》《尹诰》等“书”类文献蕴含着墨家“顺天志”“明鬼神”“尚贤”等思想观念,通过传“书”、改“书”、造“书”,墨家突出了上帝神鬼的现实政治功用,展现了独特的历史书写意识,这都能说明清华简“书”类文献系墨家传本。墨家通过改作史实,把伊尹、傅说打造成出身卑微但功绩卓绝的贤人,借此将冲决贵族血缘关系合法性主张置于墨家化的历史故事之中。清华简《治邦之道》《治政之道》则反映出战国中后期墨家通过批判现实、选贤任能体制化及吸收其他诸子立论等方式,从理论建构层面进一步扩充了贤人观。

**关键词:**清华简;“书”类文献;墨家;贤人观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2-0122-07

关于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文本性质问题,学界已做过一些探讨。裘锡圭认为,清华简并未受儒家《诗》《书》选本影响,所搜集的《诗》《书》绝大部分不见于儒家选本,见于儒家选本的部分其篇名也不相同,其文本也明显有异,因此今传《尚书》《诗经》属于儒家系统,清华简的《诗》《书》则属于非儒家的流传系统<sup>①</sup>。刘光胜论证了清华简“书”类文献和儒家《尚书》及《逸周书》的不同,认为与《尚书》相比,清华简“书”类文献多巫鬼之事,其思想特征是巫术色彩浓厚<sup>②</sup>。程浩认为清华简“书”类文献可能与墨家选编的“书”有关<sup>③</sup>。清华简所见墨家贤人观问题,夏大兆、黄德宽<sup>④</sup>、刘成群<sup>⑤</sup>、马腾<sup>⑥</sup>、陈民镇<sup>⑦</sup>等也有较深入的研究。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申论清华简“书”类文献系墨家传本说,并在论证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探研清华简所见墨家眼中的历史人物范型及贤人观的扩充机制。

## 一、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文本性质

### (一)清华简“书”类文献所见鬼神观

墨家认为鬼神实有,具备赏善罚恶的能力,主张“当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sup>[1]241</sup>。墨家之所以提倡“顺天志”“明鬼神”,“此其藉鬼神之制裁,以防止相恶相贼而增长相爱相利也”<sup>[2]</sup>。在墨家的思想视域中,鬼神是实现“义政”的保障,统治者要尊天敬鬼,方能得到鬼神之福,建立良善的社会秩序<sup>⑧</sup>。

墨家“顺天志”“明鬼神”的思想主张蕴含于清华简“书”类文献当中。清华简《程寤》记述文王因太姒寤梦而敬商人之神、祭祀祝祷周人之神,侧面反映出传此篇者相信鬼神实有。《程寤》见于《逸周书》,与《寤敬》《和寤解》《武寤解》同为“寤”体“书”类文献。“寤”通常表现为因梦而

收稿日期:2023-10-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甲骨卜辞所见人与动物权力关系研究”(21BZS105)。

作者简介:李健胜,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南长沙 410081),主要从事先秦秦汉思想文化史研究。

寤,因寤而惊,因惊而悟,从而与现实活动相联系,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书”类文献中的“寤”体篇章,与当时对梦境的神异认识和现实政治对神权支撑的需求有关<sup>⑨</sup>。这些“寤”体“书”类文献不符合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因此皆未选入儒家《尚书》而保留在《逸周书》中。《寤敬》《和寤解》《武寤解》只记寤梦,文章短小,内容当接近祖本,而清华简《程寤》由太姒寤梦、文王占卜、文王教戒太子发三部分组成,其文本形态上可能存在一个“层累”作成的过程,从《程寤》承纳上古巫卜传统、强调任用贤能等内容看,其文本上的“层累”当系墨家所为。

如果说清华简《程寤》只能反映墨家所传“书”类文献的表层特征,那么,清华简《说命》则更能直接、典型地反映出墨家的鬼神观。清华简《说命上》:“王乃讯说曰:‘帝抑尔以畀余,抑非?’说乃曰:‘惟帝以余畀尔,尔左执朕袂,尔右稽首。’王曰:‘亶然。’”<sup>[3]122</sup>《说命(中)》以“原比厥梦”<sup>[3]125</sup>的怪诞故事,强调武丁和傅说同时梦见上帝赏赐傅说给武丁,极力渲染上帝神力,与墨家“顺天志”思想完全相合。

清华简《说命》以巫鬼之事渲染商灭豕韦,也反映了墨家崇信上帝,相信鬼神实有等鬼神观。《说命上》:“天乃命说伐失仲。失仲是生子,生二戊(牡)豕。失仲卜曰:‘我其杀之,我其已,勿杀?’勿杀是吉。失仲违卜,乃杀一豕。说于围伐失仲,一豕乃保以,乃逸,邑人皆从,一豕仲之自行,是为赤俘之戎。”<sup>[3]122</sup>曹定云认为,“生二戊(牡)豕”就是生了两个“日名”为“戊”的“双胞胎”<sup>⑩</sup>。占卜结果是“勿杀是吉”,但失仲违背占卜,杀了一头。傅说围攻失仲时,失仲和他的儿子逃亡,豕韦部落的百姓从之,化身为“赤俘之戎”。杨善群认为清华简《说命》所记“离奇的神话故事”不可能是《尚书·说命》的原文,是战国时人根据某些传说资料而编造的游戏之作<sup>⑪</sup>。上述文献反映了以猪为图腾的豕韦部落因实力增强威胁到商国,武丁遂派傅说攻灭之,失仲或带族人逃亡,没入戎人的史实。《商书》中当有傅说攻打豕韦部落一事的原貌,但经墨家转述,人鬼混杂,荒诞不经,上帝、鬼神高尚、神圣的一面被消解,武丁和傅说的文治武功也被鬼神的政治功能所取代。

《赤鹄之集汤之屋》记有小臣伊尹偷喝商汤

赤鹄之羹并逃往夏国,汤以巫术诅咒之,伊尹病倒后得灵鸟解救,天巫附体,至夏国后解除夏桀疾患之事,整理者认为可能与《楚辞·天问》中的“缘鹄饰玉,后帝是飧”有关,有着浓厚的巫术色彩<sup>[3]166</sup>。尽管内容荒诞不经,但所载伊尹并非诚心投靠夏桀的信息,与《尹至》所载伊尹自夏至商,商汤对伊尹说“格,汝其有吉志”<sup>[4]128</sup>等内容构成完整的叙事链,“夏播民人于水曰战,帝曰:‘一勿遗’”<sup>[4]128</sup>之语,则突出了上帝在灭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典型地反映了墨家的鬼神观。

需要指出的是,清华简“书”类文献所见鬼神观并非其独有的文本属性,儒家《尚书》中亦有言及鬼神、占卜等的“书”类文献。伪《古文尚书·周书·泰誓中》记载,周武王在孟津誓师时的梦占之举:“天其以予义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sup>[5]</sup>“朕梦”“朕卜”指武王梦兆和之后的占卜,它们都是吉兆,意味着伐商必胜。不过,伪《泰誓》未像清华简《程寤》那样详记梦境,也没有清华简《说命》《赤鹄之集汤之屋》那样神奇怪诞的内容。司马迁曾云:“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sup>[6]</sup>敬天畏神是商周固有的文化传统,诸子或多或少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不同的是,儒家看重的是上帝鬼神信仰的超越性、神圣性,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秩序、规范意涵,而墨家偏重鬼神的政治功能,为论证鬼神实有且能发挥切实的政治功用而消解了鬼神信仰的神圣性,确有“蔽于用而不知文”<sup>[7]</sup>的认知倾向。

## (二)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儒家《尚书》差异

《汉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sup>[8]</sup>史官所记“书”或“藏在周府,可覆视也”<sup>[9]</sup>,或由获赐者“受书以归,而舍奠于其庙”<sup>[10]</sup>,皆为“书”类文献的底本,后世所见儒家《尚书》及《逸周书》只是其中的选本。墨家所传“书”类文献中既有与儒家共传者,当有未经墨家化的篇章,故笔者所言清华简“书”类文献系墨家传本说,并非指所有篇章皆为墨家按己意改作,也不是说墨家《尚书》和儒家《尚书》诸篇皆有本质性的文本差异。不过,清华简“书”类文献的出土说明战国中期流行着有别于儒家《尚书》的选本,墨家对

“书”的认识也有别于儒家《尚书》的传承者。

一般而言,判定“书”类文献的标准应是篇章内容是否见于今本《尚书》,是否作为“书”而为先秦文献所明确称引,若无称引,则是否与既有称引存在明确成组关系<sup>⑩</sup>。清华简“书”类文献对于了解战国中期诸子对“书”的认识及“书”的范围提供了难得的文本参考,从中可以看出传承这些“书”类文献的墨家并无儒家那样的尊“书”意识,在他们眼里,上古之“书”可为其鬼神观背书,认为“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sup>[1]241</sup>。他们还把上古之“书”和所造之“书”混在一起,使“书”成为承载其上帝鬼神观、贤人观等思想主张的文本载体。

在墨家的文本形态视域中,借“书”表达己意的功能主义书写意识被放大,这使得一些墨家“书”类文献带有鲜明的“语”类文献的特征,一些则因取消了明君贤臣之德的神圣性,具有实态化和写实化的文本书写特征。比如,墨家视《赤鹄之集汤之屋》为“书”,目的在于和《尹至》《尹诰》这类源于“商书”的文献共同构成塑造、宣传伊尹这一位卑德高贤人的文本系统,以墨家的思想主张规训文本书写,通过改编既有的“书”并创造新的“书”,达到宣传、弘扬己意的目的,而文本意义上的“书”须是“上古时期各个朝代,由史官所撰写、记录并加以整理的典章号令、君臣言论、王室辞令等历史档案,并具有资鉴治政和道德教化的思想价值”<sup>[11]</sup>。因此,无论是否视《赤鹄之集汤之屋》为“书”,都可证明墨家“书”类文献与儒家《尚书》在文本性质及书写方式上存在鲜明差异。

由于清华简“书”类文献在文本内涵和书写方式上与儒家《尚书》多有不同,其中一些篇章一经公布便引起不小的争议,墨家对“书”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者们对清华简文献性质的判断。刘光胜从竹简形制、字体特征、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用语习惯、思想倾向等方面考量,认为《赤鹄之集汤之屋》并非楚地小说,当属于“书”类文献<sup>⑪</sup>。刘成群则认为“以简长这一形制特点作为界定清华简《书》类文献的首要依据恐怕是有问题的”,理由是从郭店简、上博简等出土文献的竹简形制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尚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竹简形制,抄写所用竹简形制与其文本内容之间也不存在相对固定的关系,事实上竹简长度直至汉初仍然不存在“系统

的定制”,《赤鹄之集汤之屋》这样在体例、思想倾向上与今本《尚书》《逸周书》迥然不同的篇目,应当是墨家的说“书”类文本,而不应当归入“书”类文献。不过,在认定哪些篇章属于“书”类文献的问题上,刘成群认为按照墓主人的标准,《金縢》《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程寤》《皇门》《祭公》《命训》《保训》《耆夜》《厚父》《封许之命》《殷高宗问于三寿》《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计十五篇皆属于“书”类文献<sup>⑫</sup>。

直到战国时期,尽管“书”仍为记录上古帝王言论类文体的统称,但基于某种政治立场和思想主张的“书”类文献分类、汇编乃至“创作”行为已然出现。从文本传达出的思想旨趣和价值倾向看,儒家《尚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宣扬德治,弘扬仁君治民之道、强调贤臣事君之法是其传承“书”类文献的根本目的,儒家借此想要建构以等级差序为基本框架的政治伦理观。与之相比,墨家“顺天志”“明鬼神”“兼相爱”等思想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等级的,反映了战国时期巫鬼观念盛行、血统论崩坏、个体才能受到重视等政治动向和社会风尚,墨家塑造的贤人伊尹形象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此外,清华简“书”类文献的墨家化色彩并非孤例。据刘全志分析,清华简《系年》的整体结构与编纂理念与儒家的礼、德观念不符,文本在开端与行文之中强调上帝天神的信仰观念,与墨家“顺天志”“明鬼神”的学派理念相契合。《系年》叙事以晋楚武阳之战为终点,并有意突出鲁阳公、阳城君等人的勇气与牺牲,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和情感态度展现出书写主体对墨家“舍生取义”精神的高扬,结合长台关楚简和传世文献对墨家活动的记载,可证清华简《系年》成书于墨家学者之手<sup>⑬</sup>,这或许能进一步说明入藏清华大学的这批楚简总体上与墨家有着紧密关系。长台关楚简、清华简的出土可证墨家试图在楚地扩大其思想影响力,而郭店简、上博简的出土可证儒家也在楚地积极传播其思想主张。大量文献的出土证明,在那个百家争鸣的特殊时代,墨家通过传“书”、改“书”、造“书”,将自己的思想主张融入其中,形成有别于儒家的“书”类文献,展示了与儒家“书”类文献叙事模式有明显区别的历史书写意识,这说明战国乃至秦汉时期的“书”类文献多为原始文献基础上的再创作,不能简单地以“真”

“伪”评判其史料价值,而应当把研究重点放在“书”类文献背后的书写动机及其思想史意义上。

总之,清华简《程寤》《说命》《尹至》《尹诰》等“书”类文献蕴含着墨家“顺天志”“明鬼神”“尚贤”等思想观念,墨家通过传“书”、改“书”、造“书”,突出了上帝神鬼的现实政治功用。墨家对“书”类文献文本形态及其价值内涵的认识有别于儒家《尚书》,而这些“书”类文献及其他反映墨家思想的清华简材料为分析墨家贤人观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 二、制造贤人:墨家眼中的历史人物范型

战国诸子中,在冲决血统论樊篱、力倡选贤任能方面,墨家认为贤人“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sup>[1]67</sup>,出身卑微但才德出众者才是真正的贤人,“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馭众、治政、临事、长官”,面对血统论牢不可破的社会现实,他们发出“彼善与不善,岂有恒种哉”<sup>[12]136-138</sup>的质问。在历史人物范型的生成机制上,墨家走的是借古讽今,进而通过改造史实,把贤人观加诸往圣先贤之身,以增强立论说服力的思想观念生成之路。

前述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记有小臣伊尹之事,《汤处于汤丘》则说商汤娶妻于有莘氏,商汤和小臣伊尹共同“基谋夏邦”<sup>[13]</sup>。此外,《汤在啻门》记述了商汤和小臣关于成人、成邦、成地、成天之道的对话。《汤处于汤丘》与《墨子·贵义》所记商汤聘迎伊尹故事大体相同,不过简文重在叙述伊尹以“烹之和”喻政,表达了贤者以贫贱之身辅佐英主的思想主张,而《贵义》主要体现君王尚贤、重义的思想<sup>⑩</sup>。《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墨子》所见伊尹形象颇不相合,但结合与其首尾连贯的《尹至》《尹诰》可知<sup>⑪</sup>,商汤与伊尹君臣失和,逃往夏国,但他并没有真心效忠夏桀,《尹至》开篇云“惟尹自夏徂亳”,意即伊尹从夏至商都亳,商汤对伊尹说:“格,汝其有吉志。”<sup>[4]128</sup>从商汤赞许伊尹回归商都的口气看,伊尹到夏桀之国的真实目的是助汤灭夏。在伊尹的谋划下,商汤“自西捷西邑,弑其有夏”<sup>[4]128</sup>。《尹诰》中伊尹献上“后其賚之,其有夏之[金]玉宝邑,舍之吉言”<sup>[4]133</sup>的治国良策。

清华简《尹至》《尹诰》当是“商书”的一部分,其文本形态上存在一个“层累”作成的过程<sup>⑫</sup>,可能和《吕氏春秋·慎大》《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同源异流。据学者研究,《尹至》《尹诰》记录的伊尹事迹与甲骨文透露的信息明显有异,其故事构成的基本元素和体现的主要思想是春秋战国文献中才出现的,简文形成的时间大概在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作者在参考“书”类文献的同时,可能整合了当时有关伊尹事迹的传说并融入某些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将伊尹助汤灭夏的事件条理化、系统化和细节化<sup>⑬</sup>。从《尹至》所载“汤盟誓及尹”<sup>[4]128</sup>和《尹诰》所载“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sup>[4]133</sup>的史实和言论看,《尹至》《尹诰》所见伊尹事迹相对接近史实,如若这些“书”类文献由墨家传承,最多算是他们制造贤人伊尹形象的基础性文本,在墨家造“书”之作的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汤处于汤丘》等佚文中,墨家进一步发挥、改作史实,把伊尹打造成一个出身卑微但功绩卓绝的贤人。

《韩非子·难言》云“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sup>[14]</sup>,这是二者政治才能的真实写照。但是,上述清华简文及“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sup>[1]47</sup>、“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sup>[1]58-59</sup>、“汤有小臣”<sup>[1]72</sup>等墨家言论却呈现出“一边倒”的叙事现象,商汤的睿智神武、雄才大略被弱化,伊尹虽是庖厨出身的“贱人”<sup>[1]441</sup>,商汤却虚心地反复向伊尹求教,呈现出商汤师事伊尹的叙事格局,而这与儒家《尚书》中商汤、伊尹并重的史观倾向也并不一致<sup>⑭</sup>。实际上,墨家所言伊尹上述身份实为杜撰,他并非姒姓的有莘氏人,也非庖人出身的媵奴,而是因遭洪灾与莘氏并族的子姓伊氏之长,他有效促成了殷氏、莘氏、伊氏战略同盟的建立,奠定了推翻夏桀统治的政治军事基础,在夏朝贵族国家体制下,伊尹往来夏商之间属于正常的政治活动而不是有意为之的间谍行为<sup>⑮</sup>。伊尹固然有助汤灭夏之功,但把伊尹塑造成出身低贱但厥功至伟者,而把商汤塑造为从善如流的贤君形象,显然是墨家有意为之的。

墨家为何要把伊尹塑造成一个位卑功伟的贤人形象?这首先与墨家学派的社会属性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墨家由反贵族血统论而“尚

贤”，又从“尚贤”角度批评儒家的“尊尊”，反映了战国时期地位卑下但学识出众者强烈的参政愿望。在“尚贤”思想的理论建构方面，墨家提出“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sup>[1]60</sup>，“天子”受命于“天”并由“天”选出的前提是“尚贤”<sup>[15]</sup>，而“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sup>[1]72</sup>。贤能之人要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sup>[1]70</sup>，即“尚贤”须服从于“兼爱”<sup>[16]</sup>。总之，在墨家的思想视域中，贤人是融通其核心思想主张的人事基础。

从上述分析看，把冲决贵族血缘关系合法性的主张置于墨家化的历史故事之中是墨家建构贤人观的重要方式，除伊尹外，辅佐武丁的傅说也呈现出类似的人物形象。《墨子·尚贤中》：“傅说被褐带索，庸筑乎傅岩。”<sup>[1]59</sup>傅说是身着粗布衣服、系戴绳索、服筑城劳役之刑徒。《墨子·尚贤下》：“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孙诒让注：“周以圜土为系治罢民之狱。据此书，则殷时已有圜土之名，不自周始矣。”<sup>[1]68</sup>“圜土”系周代监狱，孙诒让认为“圜土”之称早在商代已出现。傅说居“圜土”，自然是犯罪之人。清华简《说命》：“说于韦伐失仲，一豕乃旋保以逝，乃践，邑人皆从……其惟说邑，在北海之州，是惟圜土。”<sup>[3]122</sup>傅说可能做过豕韦部族的“胥靡”，为其筑城劳作，辅佐武丁击败豕韦后，封于“圜土”<sup>[17]</sup>。在墨家的思想视域中，和伊尹一样，傅说也是一个社会地位卑下的贤人。

### 三、扩充贤人观：战国中后期墨家的理论建构

先后公布的清华简《治邦之道》和《治政之道》文意相通，实为首尾完整的一篇<sup>[18]125</sup>，其思想主旨与墨家相合<sup>②</sup>，集中体现了战国中后期墨家在扩充贤人观方面的理论思考。

首先，《治邦之道》和《治政之道》从批判现实角度进一步扩充墨家贤人观。战国中后期，一些国家在选人问题上仍拘泥于旧制，在楚国，异姓卿士不为世家大族所容，新旧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激烈，极力宣扬贤人观的战国简牍多出土于楚地或许不是巧合。针对这种情形，墨家从身份贵贱与否并不影响辅佐君主治理国政出发，提出“贵贱之位，岂或在它？贵之

则贵，贱之则贱，何宠于贵，何羞于贱？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驭众、治政、临事、长官”，批评“愚者”在治国问题上仍强调“在命”<sup>[12]136-138</sup>。

墨家还从批评权贵贪婪、失德、暴戾等角度，进一步消解血统论的合法性。凭血缘关系上位的“正卿大夫”，“卷粮暴赢，以渔其邦，及其野里四边”，他们贪婪无耻，专事于“聚厚为征贷，以多造不用之器，以饰宫室，以为目观之无既”，致使“邦家之多病”。针对这些情形，墨家质问统治者：“夫岂令色、富贵乃必或圣乎？”<sup>[18]128-129</sup>

其次，清华简《治邦之道》和《治政之道》从平民参政体制化的角度进一步扩充贤人观。《治邦之道》云：“今夫逾人于其胜，不可不慎，非一人是为，万民是为。举而度，以可士兴；举而不度，以可士崩。”<sup>[12]137</sup>意思是说不能不顾实际地提拔人，要“举而度”。在如何选任贤人方面，《治邦之道》提出：“故兴善人，必熟问其行，焉观其貌，焉听其辞。既闻其辞，焉小穀其事，以程其功。如可，以佐身相家。”<sup>[12]137</sup>意思是说，提拔人才的前提是“问其行”“观其貌”“听其辞”，然后给一个小官职来考验他，如果有真才实学，再委以重任。简文所谓“小穀其事”针对的自然不是贵族，而是贫贱之人，考察他们的重点在于个人能力。《治政之道》强调“兴人是慎”，认为“苟其兴人不度，其废人或不度，起事必或不时”，若如此，便会造成“车马不完，兵甲不修，其民乃寡以不正”<sup>[18]129</sup>的后果。《治邦之道》和《治政之道》所见“度”人之法与清华简《芮良夫毖》“恂求有才，圣智用力。必探其宅，以亲其状，身与之语，心求其上”<sup>[3]145</sup>的选人之法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治邦之道》和《治政之道》所见“度”人之法，主要针对的是从贫贱之人中选出贤能，以此建构实现平民参政的选人体制。

此外，《治邦之道》和《治政之道》从社会分工角度试图将贤人观体制化。《治邦之道》云：“君守器，大夫守政，士守教，工守巧，贾守贾鬻聚货，农守稼穡，此之曰修。”<sup>[12]137</sup>每个人都有其职守，且每种职守都有一定的执事原则或行事标准，而贤人则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只有遵循社会分工的基本法则，才能实现贤人执政。

执政方式的体制化也是扩充贤人观的重要体现。《治邦之道》提出，贤人执政第一要做到“男女不失其时，则民众”，意思是说男女适时婚

配则对人口增加有利。第二,在市场管理方面,“薄关市,则货归,民有用”,减少关卡和征税,有利于货物流通。第三,在葬俗方面,贤能之人应当推行节葬,“不厚葬,祭以礼,则民厚”,以薄葬之礼整顿不良社会风气,使百姓能够积累财富。第四,“不起事于农之三时,则多获”,意谓在春种、夏长、秋收之时,不能随意征调百姓。第五,贤能之人为政要做到“各当一官,则事靖,民不缓”。意谓百官恪守其职,则会诸事可安,百姓也不会懈怠。第六,在管理民众方面,简文提出“爱民则民孝,知贤则民劝,长乳则畜蕃,民有用”。《说文》谓“劝”为“勉也”<sup>[19]</sup>,《论语·为政》:“举善而教不能,则劝。”<sup>[20]</sup>第七,在对外关系方面,简文主张“谨路室,摄汜梁,修谷滢,顺舟航,则远人至,商旅通,民有利”<sup>[12]</sup><sup>138</sup>。“远人”既指“海内”他乡之人,也指“海外”之人,《虞夏殷周之治》以“海外有不至者”“海内有不至者”来表达礼乐之风一代比一代奢靡的后果<sup>③</sup>,可见“远人”是否能“至”是国家兴衰的一大标志。贤人执政要做到修建、疏通梁津,改善交通住宿条件,如此则“远人至”,百姓也可从中获利。

最后,吸收其他学派在选贤任能方面的主张,也是战国中后期儒家扩充贤人观的一种方式。《孟子·梁惠王上》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sup>[21]</sup>《治邦之道》所谓“不起事于农之三时”就是“不违农时”,《治政之道》也把“妨民之务”<sup>[18]</sup><sup>129</sup>视为坏政,这说明儒、墨两家都主张“不违农时”的安民之道。《治政之道》提出“上施教,必身服之”“上风,下草。上之所好,下亦好之”<sup>[18]</sup><sup>126</sup>,其中的道德教化主张明显与儒家德治思想相通。《治邦之道》和《治政之道》有着明显的崇礼义、重教化的思想倾向,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两篇佚文总体上更接近儒家思想<sup>④</sup>。在韩非看来,墨家和儒家一样,“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sup>[22]</sup><sup>500</sup>,二者皆专事于务德而不务法,这是韩非所不能接受的。事实上,儒、墨两家在实现选贤任能的方法及贤人执政方式上的确有诸多思想共域,这是战国中后期诸子思想交融的产物。不过,从这两篇佚文的总体思想特征看,显然是宣扬墨家贤人观的作品,其中的儒学思想是墨家吸收、兼采儒家主张,以扩充、夯实他们贤人观的理论基础。

《治邦之道》和《治政之道》所见人才观更偏

重于“使能”的一面。墨家告诫统治者,“贵人以色,富人无量”,只能导致“又为子图,又为孙图”的唯血统论,而贵族子弟只知以家世、门第博取富贵,不屑于养成个人能力,这是“危身坠邦之道”<sup>[18]</sup><sup>128-129</sup>。想要避免“邦家昏乱,翦小削损,以及于身”的下场,就要在用人上“不辨贵贱,唯道之所在”,否则“如无能于一官”,则“彼士及工商、农夫之惰于其事,以偷求生”<sup>[12]</sup><sup>136-137</sup>,国家也会因此败亡。法家主张“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sup>[22]</sup><sup>463</sup>,他们不讲求臣下以忠信、礼义尊奉君上,但强调个人能力的重要性和赏罚分明的用人之道,上述墨家的言论中也透露着偏重“使能”的人才观念,而这说明在“使能”方面,墨、法两家的主张也有相通之处。

综上,清华简“书”类文献当为墨家传本,所载贤人观念明显有别于儒家《尚书》。清华简《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说命》等通过改作史实,把伊尹、傅说打造成出身卑微但功绩卓绝的贤人,借此把冲决贵族血缘关系合法性主张置于墨家化的历史故事之中。清华简《治邦之道》《治政之道》反映出战国中后期墨家从批判现实、选贤任能体制化及吸收其他诸子主张角度,从理论建构层面进一步扩充了其贤人观。

#### 注释

- ① 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1—18页。② ② 刘光胜:《同源异途: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儒家〈尚书〉系统的学术分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③ 程浩:《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301—304页。④ ④ ④ 夏大兆、黄德宽:《关于清华简〈尹至〉〈尹诰〉的形成和性质——从伊尹传说在先秦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的流变考察》,《文史》2014年第3辑。⑤ 刘成群:《清华简与墨学管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⑥ ⑥ ⑥ 马腾:《论清华简〈治邦之道〉的墨家思想》,《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⑦ 陈民镇:《清华简〈治邦之道〉墨家佚书说献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⑧ 盖立涛:《墨家鬼神观新论》,《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3期。⑨ 马智全:《清华简〈程寤〉与〈书〉类文献“寤”体略探》,《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⑩ 曹定云:《清华简〈说命上〉“二戊豕”解——兼论〈说命〉的真实性与传抄时代》,《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⑪ 杨善群:《清华简〈说命〉性质探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7年第4期。⑫章宁：《“书”类文献刍议》，《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1期。⑬刘光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173页。⑭刘成群：《清华简与古史甄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4—73页。⑮刘全志：《清华简〈系年〉的成书与墨家学派性质》，《浙江学刊》2021年第2期。⑯沈建华：《清华简〈唐（汤）处于唐丘〉与〈墨子·贵义〉文本》，《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⑰肖芸晓：《试论清华竹书伊尹三篇的关联》，《简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71—476页。⑱程浩：《古书成书研究再反思——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⑲杜勇：《清华简与伊尹传说之谜》，《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⑳石小力：《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与上古礼乐制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㉑陈民镇：《清华简〈治政之道〉〈治邦之道〉思想性质初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 参考文献

- [1]孙诒让. 墨子间诂[M]. 孙启治,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2]方授楚. 墨学源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11.
- [3]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叁[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2.
- [4]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壹[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0.
- [5]十三经注疏: 尚书正义[M].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385.
- [6]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3223.
- [7]王先谦. 荀子集解[M]. 沈啸寰,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463.
- [8]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715.
- [9]十三经注疏: 春秋左传正义[M].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4638.
- [10]十三经注疏: 礼记正义[M].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3484.
- [11]禄书果. 清华简《书》类文献整理与研究[D]. 郑州: 郑州大学, 2019: 28.
- [1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捌[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8.
- [13]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伍[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5: 135.
- [14]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钟哲,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23-24.
- [15]李贤中. 墨家“尚贤”思想探析[J]. 周易研究, 2014(1): 82-89.
- [16]薛柏成. 墨家思想新探[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14.
- [17]刘光胜. 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傅圣生平事迹新探[J]. 古代文明, 2018(4): 35-42.
- [18]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黄德宽.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玖[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9.
- [19]许慎. 说文解字[M]. 陶生魁,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458.
- [20]刘宝楠. 论语正义[M]. 高流水,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64.
- [21]焦循. 孟子正义[M]. 沈文倬,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57.
- [22]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钟哲,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The Text Nature of the Documents of Shangshu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and the Expanding Mechanism of the Mohist Sages View

Li Jiansheng

**Abstract:** The documents of Shangshu in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such as the *Chengwu*, *Yueming*, *Yinshi* and *Yingao* contained the ideological concepts of Mohist school such as “obey fate” “showcasing ghosts” and “advocating for sages”. Through the transmission, modification, and creation of Shangshu, Mohist school highlighted the practical political function of Gods and ghosts, demonstrating a unique historical writing consciousness. These can all indicated that the documents of Shangshu in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were Mohist transmissions. The Mohist school transformed Yi Yin and Fu Yue into virtuous individuals from humble backgrounds but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by rewriting them as historical facts, thus placing the proposit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breaking away from aristocratic blood relationships in the historical stories of Mohistization.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e Way of Governance* and *The Method of Governance* reflected that in the mid to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Mohist school further expanded the concept of sages from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level by criticizing reality, institutionalizing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talents, and absorbing the opinions of other scholars.

**Key words:**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the documents of Shangshu; Mohist school; sages view

[责任编辑/启 轩]